

编者按：近段时间，中央多次提到“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双循环”成为市场热议的话题。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强调要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以共建共治共享拓展社会发展新局面。

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党中央作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部署，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这意味着，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向内看，国内发展环境也经历着深刻变化，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我们应当正确认识，做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规律显示，在发展水平到了一定阶段后，都要逐步从以国际大循环为主的发展模式转变为以内需为主的发展模式。现在我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比较优势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丰富劳动力，转变为超大的市场规模、完整的产业体系等。随着我国相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体量持续增大，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必然会逐步下降，将满足国内需求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打通国内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各个环节，是我国走向现代化强国的必然选择。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丰富的内涵。一方面，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发展国内循环和发展国际循环的着力点大致相当，一样要保护知识产权、改善营商环境、减少准入限制，一样要依托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完备的基础设施等。另一方面，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可以使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更加稳固。只有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融合，才能优化生产要素的跨国配置和扩大优质商品、服务进口，满足国内的生产和消费需求，使国内大循环更加通畅、分量更重。

本期推出“经济双循环”专题，有针对性选取相关文章，了解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的深刻内涵，分析我国如何增强经济内循环动力，构建稳定有序的经济循环体系，同时更高水平地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体系，融入全球经济大循环。希望能为盐城市相关政府部门提供一些有意义的参考、思索和方向。其他栏目的文章也期盼引起您阅读的兴趣。

本期专题 · 经济双循环

- 02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深刻内涵
- 05 以双循环稳住中国经济基本盘
- 07 如何打通“国内大循环”
- 09 江苏构建“双循环”的关键突破口
- 10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是自我封闭
- 12 经济双循环要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全球大观

- 14 中美新冷战虚实几何

政坛经纬

- 16 提高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

文化漫步

- 18 小小餐桌，何以牵动中国？
- 19 杜绝“舌尖上的浪费”需建立长效机制

悦读时光

- 封三 信息时代，做好加减法

主 管：盐城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主 办：盐城市图书馆

刊头书法：臧科

主 编：黄兴港

副 主 编：张安红

责 编：王智芹

地 址：盐城市城南新区府西路6号

邮 编：224005

电 话：0515-69971581 18751431986

邮 箱：417967615@qq.com

网 址：www.yctsg.cn

设计制作：盐城微数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单位：盐城银河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日期：2020年8月28日

印 数：6200-6400

构建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的深刻内涵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内涵十分丰富。我们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绝不是关起门来搞封闭运行。要看到，国内国际循环是相互促进的统一整体。因此，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主攻方向，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强大支撑，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明确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这是适应我国比较优势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适应国际环境复杂深刻变化的迫切要求，是当前和未来较长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我们要将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攻方向，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强大支撑，推动国内供需更高水平平衡，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育新机开新局。



深化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内涵的认识

总的来看，“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内涵十分丰富，我们要

准确把握其核心要义和基本要求，这是我们做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工作的基础和前提。

首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大循环是指社会再生产全过程包括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往复循环。其中，生产是起点，流通和分配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桥梁，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也是新一轮再生产的起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大循环必然是实物运动循环和价值运动循环的结合，是实体的商品生产、分配、流通、消费过程与货币资金运动在社会再生产全过程合理分配流动循环相结合的过程。此外，在社会分工日益发展深化条件下，经济大循环必然体现为社会再生产在地域空间意义上的循环，包括在国内的城乡和区域间的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指社会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带动，对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循环具有较强的控制力。事实上，从国际经验看，任何一个大国经济或大型经济体都是以国内需求、国内市场为主体的，外部需求和国际市场只是国内市场和国内需求的延伸和补充。

其次，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搞封闭运行。这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必须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经济大循环必然是包含在全球地域空间范围内的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指国际循环不重要了，或者说国际循环重要性下降了，而是要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进一步提升开放水平。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经验表明，用好国际市场、资源和规则，对于国内发展和改革能够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中国经济无论成长到什么时候，都要在世界经济的汪洋大海中游泳和搏击。当前，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但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是长期趋势。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促进发展、改革和创新。通过融入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循环，就要用

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扩大进口，促进高质量使用外资，加强科技领域开放合作，提升国内供给质量，推动供需平衡畅通，让中国经济在开放中欣欣向荣。

第三，国内国际循环是相互促进的统一整体。这是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国内国际循环二者缺一不可。一方面，要着力打通制约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大循环梗阻，培育形成强大国内市场，通过提升国内大循环水平更好促进国际循环。而且，从发展阶段看，目前我国已具备建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诸多有利条件，比如，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日臻完善，自主创新能力加速提升等。另一方面，要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通过国际循环更好促进国内大循环。

充分认识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性

建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在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发生复杂深刻变化，针对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出现的新情况，为解决现实问题而提出来的，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一是适应我国比较优势变化的迫切要求。过去，我国劳动力丰富，但资金、技术缺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互补性很强，通过加入国际大循环进而带动国内经济循环，可以很好地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现在，经济发展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劳动力仍然丰富，但成本持续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强化；同时资金供给相对充裕，技术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国内市场潜力巨大，科技创新、人力资源、巨大市场等新优势正在日益形成和巩固。在此情况下，过去通过“两头在外”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带动国内、首先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高速增长的循环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迫切需要适应比较优势的变化，提升国内循环的质量和效率，提升我国在国际循环中的位势，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二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阶段变化的迫切要求。过去，我国发展的重点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我们依靠“旧的双循环发展格局”参与国际经济分工与合作，大幅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现在，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城镇化率超过60%，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超过50%，总体上进入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进的新阶段。靠原有发展模式难以实现新的目标，必须更好地挖掘内需潜力、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潜力和参与引领国际循环的潜力，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提高经济自主可控发展能力，构建

新的双循环发展格局，不断缩小城乡、区域间发展差距和社会群体收入分配差距，让发展成果更好地为全体人民所共享。

三是适应国际环境深刻调整的迫切要求。过去，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我国抓住战略机遇期，积极融入国际分工与合作，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现在，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潮流，但全球化遭遇逆流，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不断发酵，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复杂性、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国际环境的复杂深刻变化，要求我们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最大程度激活内生动力和活力，以国内发展基本趋势向好的确定性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同时，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带动世界经济复苏，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扎实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建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事关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必须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主攻方向，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一是要将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加快构建完整内需体系。超大规模市场是联通国内国际市场、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优势。要将这个优势发挥出来，就要着力扩大内需。内需是由居民消费需求、企业投资需求和政府需求有机组成的体系。应针对不同类型主体的需求，坚持问题导向，打通阻碍需求潜力激发的痛点和堵点。针对居民消费需求，应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稳步提高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与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提升对农民工及其家属的保障水平，减少消费的后顾之忧；不断改善消费环境，提高商品和服务质量，推动居民消费升级。针对投资需求，应弘扬企业家精神，支持企业家专心办企业并获取合理回报，使企业“想投资”；落实好纾困惠企政策，特别是打通资金向实体经济流通的渠道，强化对市场主体的金融支持，使企业“能投资”；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形成长期稳定发展预期，使企业“敢投资”。针对政府需求，应在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让每一笔钱都花在刀刃上、紧要处。

二是要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线，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持续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与效率，是解决供需不平衡不匹配、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关键。应深入贯彻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当前形势下应将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放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工业体系完整的优势，着力推动强链补链固链，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维护产业安全。应制定实施有利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一揽子政策措施，把提升全产业链水平作为主攻方向，鼓励企业增强上下游配套能力。引导各地根据不同要素条件优化生产力布局，促进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协作。立足我国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和产业布局存在差异等特点，更好挖掘产业梯次转移的空间潜力，为沿海产业向内陆沿边地区转移创造更好的条件。

三是要将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作为主攻方向，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必须认识到，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让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的趋势，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前沿领域的科技创新和

产业发展。同时也要认识到，自主创新不等于封闭创新，而要善于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加大国际化科技孵化平台、离岸创新中心等新型平台建设力度，探索构建开放式自主创新体系，走开放创新道路。

四是要将高水平对外开放作为强大支撑，深入参与引领国际经济循环。眼下，国际金融危机前形成的世界经济三角循环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新型分工方式、新型产业链价值链和区域化供需网络正在兴起，我国在新形势下的国际经济循环中大有可为。应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一方面，要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外资市场准入，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吸引集聚更多高质量外资企业。加快中欧投资协定、中日韩自贸区等谈判，与主要发达经济体建立更加紧密的产业和市场循环关系。另一方面，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走出去”开展国际产能合作为抓手，在我国有优势、沿线国家有需求的钢铁、电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等资本品领域以及家电等消费品领域，抓好一批示范性国际循环项目，与相关国家之间形成合理分工和良性循环关系。

(2020-08-05 经济日报)

(上接第8页)

为龙头，为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具体到都市圈、城市群，刘世锦认为要推进以下两方面的要素市场改革。

1、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动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特别是创造条件让宅基地有序流转。

2、推动空间规划和公共资源配置的改革，应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比如按照人口流向来分配用地指标、财政补贴资金等，按人口布局变化定期调整规划。

刘世锦认为，当前中国实体经济存在三大短板。在基础部分，我们的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不同程度存在行政性垄断。在主体部分，我们需要消费结构升级，但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够大。在高端部分，我们的基础研发能力，特别是原始基础研究、源头创新方面的能力比较弱。“我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应该提出另外一个目标，就是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也就是，由现在的4亿人左右，用十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能够达到8亿-9亿人规模。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提高他们的收入、扩大消费，是扩大国内大循环的主要着力点”，刘世锦指出。

如何提高收入、扩大消费呢？刘世锦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要利用这点带动商业模式的创

新，进而带动技术创新。通过提高生产力，将中国变成一个生产基地和创新大国。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完善社会政策，推动人力资本的提升。随着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收入的提高，消费能力才能提升。这样，经济才能进入良性循环，这才是国内大循环的基本含义。简而言之，消费、人力资本提升、生产大国和创新大国，通过推进这几方面工作，促进经济形成良性循环，来形成国内大循环。

刘世锦还进一步提出，对于推动创新方面，建议可以在创新居于前列、科教资源丰厚的若干城市，比如杭州、深圳、内地的部分城市，像当年办经济特区那样，创办高水平大学教育和研发特区。“我们关键要营造有利于自由探索、催生重大科学发现的机制和文化，吸引全球一流人才，产生诺贝尔奖级的成果”，刘世锦表示。

刘世锦还指出，对外开放方面，应该谋划一些更具想象力和前瞻性的重大举措，必要的时候可以推出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政策。在全球化的理念和规则制定上，中国不能往后退，应该继续往前走，对全球开放发展起来引领带动作用。

(2020-8-25 思客)

以双循环稳住中国经济基本盘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阴霾下，二季度中国经济终于“转正”。7月1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初步统计，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45661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1.6%。相比一季度6.8%的负增长，二季度终于实现了3.2%的正增长。具体的数据是：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由一季度下降8.4%转为增长4.4%，服务业增加值由一季度下降5.2%转为增长1.9%，二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降幅比一季度收窄15.1个百分点，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比一季度收窄13.0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刘爱华将目前的经济回升称作“恢复性的增长”，因为从上半年来看，多数指标处于回升改善或者降幅收窄的态势。但从上半年累计的速度看，GDP、工业、服务业、投资、消费等领域大部分指标处于下降区间。

“总的来说，上半年的成绩单来之不易，当前的困难体现在叠加。即短期冲击叠加长期结构性问题，产能扩大叠加市场空间变小，基础能力不足叠加外部封锁加重，创新瓶颈叠加竞争加剧，要素配置不合理叠加机制性约束等。”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执行副院长董煜在当天中国新闻社举办的国是论坛上作出如是评

价，但表示“远远没有到可以乐观的时候”。

董煜认为，随着上半年一系列政策的落地，下半年有望恢复到接近正常，但是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都会面临与以往不同的问题，这就需要宏观政策更加积极灵活、精准到位，特别是宏观政策要更多地代入微观主体的感受，提高政策的针对性、有效性。

作为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的一项重大战略布局，“双循环”被政界、学界寄予厚望。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董煜看来，国内循环的关键是必须把国内强大市场潜力释放出来，要以质量为核心，通过提质增效，打通国内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循环，从而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出口转内销，还需扩大内需

数据显示，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142379亿元，同比下降3.2%，其中，一季度同比下降6.5%，二季度同比下降0.2%，降幅收窄。

尽管上半年实现贸易顺差11889亿元，但学界对于外贸发展的预期还是相对悲观。从刚公布的6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来看，50.9%的指数似乎不错，但6月份新出口订单指数只有42.6%，进口订单47%，在手订单44.8%，都低于50%的荣枯线水平，依然存在危机。而从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几个贸易大省来看，广东前五个月进出口下降8.8%，其中出口下降10%，进口下降7.1%。江苏、浙江也有较大幅度下降，疫情对贸易发展的负面冲击仍在持续，而且外贸依存度越高，风险越大。6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的实施意见》，在鼓励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同时，支持适销对路的出口产品开拓国内市场，以帮助外贸企业渡过难关。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国际贸易系教授、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全球价值链专家组专家崔凡

认为，目前中国的出口中，与防疫和居家办公相关的一些产品增长较多，但很多领域例如服装、鞋类、玩具等出口情况都不乐观。在这种情况下，主要应该保市场主体、保就业，让从事这些方面贸易与生产的企业能够渡过难关，通过出口转内销，使得相关的企业能够尽量维持，减少失业，同时也使得这些企业在疫情缓解后能够恢复生产与出口。“从这个意义上看，内循环在当前的情况下能够起到稳定外向型经济体的作用，使得他们今后能够重新恢复参与外循环。”崔凡说。

然而，国内消费市场依然处于恢复期，由于目前消费恢复还是面临着制约，尤其是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条件下，一些聚集性、接触性的消费活动仍然受到一定制约，因此，目前商品零售的餐饮收入还处于恢复增长的态势。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仍然处于下降区间，比上年同期下降 11.4%。在这样的情况下，出口转内销能否起到预期的效果？

“出口转内销还需适度。”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王孝松看来，国内需求也是有限的，关键在于如何“转”，以及如何进一步开拓国内市场，而不是回到封闭的状态。

怎样扩大内需，让老百姓更舍得花钱？王孝松表示，这涉及改革的很多深层次问题，比如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良好的医疗体系，培育更多的中等收入人群等，如此才能够做大蛋糕，有效扩大内需，而非一味地出口转内销。

延长产业链供应链

相比疫情带来的冲击，全球经贸格局的变化，似乎为下半年中国的经济带来更大不确定性。董煜分析，随着国际疫情的演变，可能不利的影响和挑战因素会进一步增多。外需市场可能反弹乏力，各国会更加基于安全而不是效率配置产业链，从而使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问题更为突出。而来自国际政治的博弈和地缘政治的影响会对中国经济造成更大的挑战。“而且，这样的困难和挑战，可能不会只持续半年，也许会在“十四五”的前期继续影响，甚至可能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修复期。这就使得分析形势、判断趋势变得格外复杂。”

“上半年中国的外贸负增长主要是受疫情影响，一旦疫情控制住，从数据上来看，恢复到比较高的增长率是没有问题的。”王孝松认为，更需要警惕的是短期内的供应链危机。过去，中国一些关键的中间产品，如机电产品、电子产品、高科技产品等零部件多是国外供给，一旦真的发生了中美经贸脱钩，或者发达国家联合起来封锁中国的局面，中国在全球的供应链就存在风险。“因

此，不能一味地依赖国际市场，更不能一味地依赖国外的中间产品供给。”

除此之外，全球疫情带来的停工停产，也造成了中国一些产业的“断供”。以全球化程度较高的中国汽车产业为例，海关数据显示，2019 年中国汽车零部件进口额为 367.11 亿美元，其中超过八成来自德国、日本、美国、韩国、墨西哥五个国家，单从德国进口的零部件规模就达 102.8 亿美元。央视财经近期的调查显示，截至目前，全球 26 个国家上百家汽车整车厂停工停产，中国汽车产业或将面临汽车供应链的供给考验。

王孝松认为，中央提出双循环的目的是要加强内外平衡，由于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疫情和国际关系导致国内依靠加工贸易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但从长期来看，或能倒逼着国内的企业加强自主研发，加强创新能力，加强原创性技术的供给能力，从而使中国的产业链不断加强，不但实现了中央“六保”中“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目标，更能够实现产业链的升级。

消除壁垒和瓶颈，畅通内循环

在王孝松看来，目前中国国内有一个庞大的市场，中等收入的人群越来越多，从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就能看出来，私人消费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虽然跟发达国家还有差距，也已经出现了长足的进步。但长期以来过分的依赖外需，突然转向内需，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各界还不能很快地适应。

“因此，内循环的健全发展还有待时日，只有当消费、投资，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等实现了真正的良性循环，双循环的健康体系才能够建立。”王孝松表示，目前还存在内外不平衡的状况。中国已经不断加快对外开放的进程，但很多产品的市场还比较封闭，对于国外产品、要素的进入还有高度的壁垒。因此，要想实现内循环畅通，第一步就是打破国内的这些壁垒；第二步是深化开放，无论是产品还是要素，包括投资行为，都要进一步加强开放力度。

崔凡也指出，在打造国内大循环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瓶颈与阻塞点，资本、劳动力、土地、技术、数据等各类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还非常的不完善，大量的存量资源没有被激活。

“中国国际竞争力的优势来源日益从便宜的劳动力转化为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和内需潜力。但是，这个重要的优势来源还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崔凡举例说，在汽车行业，中国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消费人群，但是行业集中度低，企业国际竞争力不高，生产的规模经济以及内循环对外循环的促进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因

如何打通“国内大循环”

8月23日,《比较》编辑室和北京基金小镇共同举办的“后疫情时期的中国经济增长”研讨会暨《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 战疫增长模式》新书发布会在线上举行。作为《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的主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发布会上介绍了该书的主要内容,并分享了他本人关于中国经济的最新思考。



关于经济形势：全年可争取3%左右的增速

“疫情暴发之初我们的判断是,二季度出口可能会大幅下滑。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出口只是小幅的负增长,说明中国出口行业这次表现出非凡的竞争力,证明中国

出口行业能经受大风大浪”,刘世锦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是对中国经济的一次压力测试,这次不期而遇的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很大压力。疫情冲击下,一季度我国经济下跌6.8%,但二季度经济增速恢复至3.2%。

刘世锦表示,从整个经济形势来看,上半年包括7月份,中国经济的表现是符合预期的,部分指标超出预期,比如出口就超出很多专家的判断。疫情冲击虽是短期的,但可能带来部分永久改变。刘世锦表示,目前供给侧恢复较快,但需求端恢复较慢。这反映出,企业或机构的反应速度,要快于个人。疫情推动了“数字化生存”,部分需求可能会永久性减少。比如今天开的这个会,线上效果不错。原来可能要找地方,部分参会人员还要坐飞机、住酒店、餐馆消费等。所以,疫情可能会影响部分服务业,包括航空业、酒店业、餐饮业等。

“中国经济总体恢复不错,尽管恢复有不平衡的状况。如果正常的话,三四季度应该能恢复到5%-6%的增速,全年可以争取3%左右的增长”,刘世锦表示。

刘世锦还指出,正常情况下,明年我国增长速度应该是在7%左右,甚至更高一点,因为今年的基数比较低。所以评价这段时间的增长,可以把2020年和2021年加起来,两年平均能有5%左右的增速就相当不错了。

按刘世锦提出的“相对增长率”的概念,2019年中

此,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应该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打破地方保护主义,促使资源在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下优化配置,形成更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数据显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连续三个月保持正增长,服务业生产指数连续两个月正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连续四个月降幅收窄,出口额连续三个月正增长。从横截面看,供给端恢复快于需求端。

“尽管目前供给端快于需求端,生产者物价指数低迷,但市场需求的激活归根结底还是需要通过供给侧改革的推进。”崔凡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积极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改革,加速西部大开发的进程,

缩小区域收入差距,通过积极保就业的政策保民生,这些都有助于激活国内大循环。此外,在当前的背景下,全面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也有重要意义。

当前中国疫情防控体系已经日益完善,能够保证安全生产。下半年,国家级第四批重大外资项目有望推出和落地,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的一些改革措施会进一步落地并开始显现出效果,国家还有可能推出新一批自贸试验区,各地营商环境有望持续得到改善。“相信下半年中国经济有望进一步恢复。”崔凡说。

(2020年27期 中国新闻周刊)

国经济增速为 6.1%，全球经济增速为 2.9%，中国的相对增长率差值为 3.2 个百分点。如果 2020 年中国经济增速能达到 3%，全球经济增速若为 -3%，那相对增长率会达到 6 个百分点。相对增长率从去年的 3.2% 到今年的 6%，反映出中国经济增长状况不错。

经济回到正常轨道后，应拓展“结构性潜能”

刘世锦表示，从宏观政策来讲，前一段时间是个特殊时期，出台了很多非常规的措施，以宏观救助为主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大量推出。随着经济逐步回到正常的增长轨道，宏观政策也应该要回归到常态。

“当然，目前还不宜明显收紧，但要防止资金过度流向股市、房市。今年宏观杠杆率上升应该是无法避免了，在稳定宏观杠杆率的前提下，要防控金融风险。另外，宏观政策要关注，金融如何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刘世锦表示。

早在 5 月份，债市收益率有所上升，资金面有所趋紧，市场已经感知到：前期应急政策要回归常态的信号。7 月初股市大涨，牛市情绪高涨，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稳预期，提醒市场风险。上半年数据发布之后，中央明确坚持不以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手段。

年中政治局会议对下半年宏观政策做出部署，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注重实效，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要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推动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等。

刘世锦表示，经济受到很大冲击后，宏观政策的作用比较明显。但宏观政策的作用是短期的，随着经济转到正常轨道，注意力应该放到拓展“结构性潜能”上来。

中国经济要想保持中速增长，必须要拓展一些新的结构性潜能。所谓“结构性潜能”，是指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在技术进步、产能和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等方面的潜能。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追赶潜能。二是新涌现的潜能，特别是数字技术和绿色发展。

刘世锦表示，去年中国人均 GDP 达到 1 万美元，多数发达经济体在 4 万美元以上，美国人均 GDP 是 6 万多美元。“我们和发达经济体至少有 3 万美元的差距。近几年，大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状况有比较多乐观的估计，但从人均 GDP 的角度来说，3 万美元的差距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追赶的潜力很大。我们还要吸收发达国家的一些先进技术、管理、体制机制等经验”，刘世锦指出。

新形势下的“双循环”应该有两个特点

7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双循环”成为市场热议的话题。刘世锦指出，现在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其实我们历来如此。

1、无论是国内循环，还是国际循环，出发点和归宿都在于国内，是以内需为基础，为了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2、从国际范围来看，大国一般都是以内需为主，即使对外开放度比较高，外贸占比比较低。只有一些小型经济体，外贸占 GDP 的比重比较高。

3、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超大型经济体，我们不仅拥有超大型的国内统一市场，还拥有 14 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有 4 亿人，这么大规模的体量就只有中国。和其他大国相比，中国更有必要和可能形成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大循环。

4、中国现在已经进入这么一个增长阶段，那就是服务业占比逐渐提升、并处于主导地位。尽管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服务业的供给和需求出现分离，比如欧冠比赛发生在欧洲，但大量观众来自中国，这个时间和空间可以分离。但是，大部分服务业还是本地化的、不可贸易的。随着服务业占比不断提升，内需比重也在不断上升，这是必然趋势。

既然我们一直如此，为何此刻要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呢？刘世锦指出，这是有众所周知的背景。

1、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深度衰退，外需在萎缩。不仅外需在萎缩，外部供给能力也在下降。中国进口减速明显，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外部供给能力跟不上。

2、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加剧，部分外需市场有可能会收缩。

3、全球化遭遇逆流，出现了卡脖子、断供等状况。包括中国在内，不只是中国，一些大中型的经济体可能都要被迫实施“产业备胎战略”。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我们一直在搞国内大循环，但是现在的大循环至少有两个特点：第一要提高内需比重，第二要提高关键技术、重要产业链的可替代性和抗冲击的韧性。这并不意味着对外开放的后退，更不是关起门来搞自给自足。相反，我们实际上需要一个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刘世锦强调。

如何打通“国内大循环”？

刘世锦表示，要打通国内大循环，需要把痛点打通，当前重点是要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在刘世锦看来，由于都市圈、城市群能产生集聚效应，带来更高的要素生产率，未来十年至少 70%-80% 的经济增长潜能，特别是创新潜能，可能都来自于此。应该要以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

(下接第 4 页)

江苏构建“双循环” 的关键突破口

江苏作为疫情控制较好但受冲击程度较大的省份，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紧迫性与必要性，尤其需要精准选择突破口，保持定力，聚力攻坚，在“双循环”的新轨道上育新机、开新局。

在开放竞争中壮大本土市场主体。市场主体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是社会生产力和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活跃的、强大的本土市场主体，是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条件。在较长时间内，江苏经济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在参与国际大循环中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但缺乏在核心竞争力和供应链整合力上的能力积累。在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下，江苏亟待推进市场主体再造。一方面，千方百计保护市场主体，继续为受疫情冲击的普通市场主体纾困输血。鉴于疫情影响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对普通市场主体的扶持政策短期内不宜退出。另一方面，推进优势企业与“终端市场”直接对接，在开放竞争中培育壮大本土领军型企业。相对于产业链细分环节，终端产品有着更为广泛的市场知晓度和影响力。江苏缺乏生产终端产品的领军企业，却不乏在行业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未来应注重引导龙头企业、平台型企业直接生产面向市场的终端产品，拓展产业链，快速提升企业能级和品牌影响力，形成参与“双循环”的关键主体。

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攻坚突破。提高各类要素的市场化配置能力是壮大和畅通经济循环的关键所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意在通过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等深层次改革，打破构建统一、开放国内市场的制度障碍，形塑“双循环”的国内市场基础，把潜在的大国市场优势转化为现实发展优势。江苏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重点，一是深化技术要素市场化改革，发挥江苏省技术产权交易市场牵引作用，探索“专利拍卖”等创新模式，活跃科技中介，强化技术市场上的知识产权保护和运营，促进科技创新成果和新技术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二

是促进劳动力市场放开搞活，重点加强科技人才、企业家人才等新型人才市场建设，在制度源头上破解江苏人才的结构性矛盾。三是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化的改革探索，率先探索数据要素的规范化治理和有偿共享和互联互通，打通要素壁垒的有效路径，释放数据要素的巨大价值。

强化优势产业集群的供应链完整性。保障供应链关键环节的有效供给，是形成国内经济循环的关键条件。江苏经济开放度高，保障产业供应链安全的压力大，关键是瞄准优势产业集群需要，有的放矢强化重点产业的供应链完整性。依托南京、苏州等核心城市及城市群，打造若干深度嵌入全球供应链体系的供应链枢纽城市，提升江苏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位势。构建高链接度的区域枢纽供应链网络，注重补足枢纽组织功能短板，提升枢纽对资源要素的配置能力。强化供应链“链主”型企业引领力，促进区域枢纽经济提质增效降本，推动区域枢纽型产业能级提升。积极发展智慧生态供应链，发展具有供应链协同效应的公共型平台，推进相关方单元化的信息数据正向可追踪、逆向可溯源、横向可对比，形成高能级、强辐射力的数字化枢纽，保障优势产业集群需求。

参与打造长三角区域市场一体化样板。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有效进路，也是形成“双循环”格局的关键环节。长三角区域市场巨大，既拥有以上海为引领的世界级城市群，也联结长江经济带广阔腹地，形成巨大的战略纵深。江苏参与长三角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的重点，一是要打破区域市场的隐形制约，促进城乡区域间要素自由流动，消除歧视性、隐蔽性的区域市场准入限制，着力推动人力资源、土地资源、科技资源等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二是加快探索建立规划制度统一、发展模式共推、治理方式一致、区域市场联动的区域市场一体化发展新机制，提升区域市场一体化层次水平。三是在培育区域市场的同时防止出现新的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并不是自我封闭

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这个重要判断引发了广泛讨论。怎样理解“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是一些人宣称的“内循环”吗？如何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和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

1、侠客岛：5月以来，中央多次提到“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一些人质疑说“国内循环根本支撑不了经济，会带来‘内卷化’”，甚至联想到了“闭关锁国”等等。怎样理解中央提出的这个新发展格局？

刘元春：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世界经济低迷、大国冲突日益加剧的宏观背景下，全球产业链和治理体系正在加速重构。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大国关系，如何参与国际产业链、价值链的重新定位，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我们提出的发展策略是市场、资源“两头在外”，这是一种外向型的经济格局，支撑

了经济长期快速发展。但现在“两头在外”的思路显然无法延续下去了，因此，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应时而生。

我注意到一些人把“国内大循环”看作是“出口转内销”，甚至是“新型闭关锁国”。这是严重误读，把“国内大循环”简单化了。要看到，一方面，国内大循环指向“提振内需”，但并不等于把曾经的外需“搬回”国内。另一方面，国内大循环的提法侧重在提升产业水平、技术水平、打破行业壁垒上，目的是让国内经济运行效率提高，这些都需要在开放经济的体系下完成，旨在构建更安全、更有弹性的供需体系。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对好理解一些，因为各国早已在产业链上深度嵌套，谁都不能封闭起来搞发展，因此中国经济仍需进一步开放、内外联动，更好地融入国际大循环。

彭文生：我想从经济学概念以及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角度谈谈这个话题。经济活动分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四个环节的循环往复，形成经济大循环。国内投资和消费等内需，可视作国内循环；净出口对应的外需，可归为国际循环。

在我看来，作为主体的国内大循环包括扩大消费、进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开放40

市场壁垒，特别是要防止开放竞争不足而出现内卷化，为形成高水平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创造有利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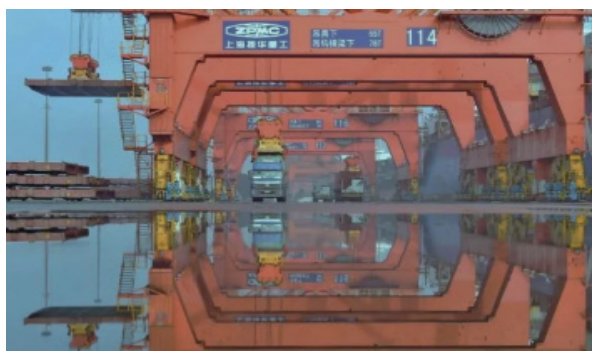
促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良性循环。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数字经济的发展步伐，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成为趋势。作为实体经济大省，江苏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关键路径是推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良性循环，形成撬动“双循环”的强支点。一是围绕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着力推进重点制造业与数字经济深

度融合，强化数字经济赋能，助力构建自主可控产业地标。二是推进数字经济与传统制造融合渗透，提升传统产业技术能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三是发力人工智能、5G、物联网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实体经济领域应用为核心，通过技术渗透、市场需求协同带动业态融合、促进上下游产业链融通发展，拓展应用场景、强核聚能壮链，锻造适应新赛道的核心竞争力。

（2020-8-11 新华日报）

多年间，中国经济几乎将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扩大财政支出、使用低利率或减税政策支持投资这三种增长模式发挥到极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中国主要靠出口拉动增长；随着人口红利减弱，劳动力工资上涨、汇率升值压力增大，单位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在下降。

之后，中国开始以房地产为主要载体刺激私人部门投资，伴以基建为主的财政支出扩张，这导致房价飞涨、财产性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影子银行、地方债问题不断累积，宏观杠杆率急剧上升。这都是不可持续的，前面提到的几种增长模式日益举步维艰。今年，百年罕见的新冠肺炎疫情又带来了巨大冲击。



与“非典”相比，新冠肺炎传染性更强且容易反复，这就意味着在“后疫情时代”，各国经济即便走向复苏，也面临需求复苏慢于供给复苏的态势。对已经受储蓄过剩困扰的全球经济而言，这无异于雪上加霜。在这种背景下，对大型经济体而言，依靠贸易顺差化解储蓄过剩是不现实的，更切实的选择就是扩大内需。以提振内需为核心的国内大循环并不意味着要“封闭”，甚至不是有些人说的封闭“内循环”。封闭运行对经济的真正打击不在于损失需求的量，而在于拖累生产效率。

因此，强调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恰恰需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内，这意味着进一步放松管制，打破行业准入的壁垒，推进国企改革、促进竞争中性，通过强化内部竞争提升效率，对外，这需要加大开放力度，通过外部竞争，推动效率提升。

2、侠客岛：前不久，我们看到有文章说“任何一个强国，一定是国内大循环的经济占GDP的80%以上，国际循环的经济占20%以内。美国如此，德国、法国、英国、日本亦如此”。是这样吗？国内大循环经济占比高，对一个强大的经济体而言意味着什么？

刘元春：具体比例可能未有定论，但这个表述的逻辑是基本成立的。中国必须以内部分工体系的完整畅通作为依托，同时以开放、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的方式

服务于整体经济循环。

彭文生：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经济全球化下各国本土化产能裕度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如口罩、防护服等短缺的供给恰恰是应对自然灾害必需品。这促使各国进一步加强对国内大循环的重视。这种动向可能会增加国内生产和消费的空间联系，使得全球产业链面临缩短的风险，对所有国家包括中国供给侧的国际循环带来挑战。疫情暴露了全球产业链的脆弱性，此时提升国内大循环经济占比，是具备合理性的。

3、侠客岛：中央提出要“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有人担心，国内的市场规模能否消化庞大外需的向内转移？会不会对国内市场在量价上形成冲击？

刘元春：“国内大循环”不等于“出口转内销”，不是把外需硬搬回国内，因此不会对国内市场造成大的冲击。另外，自从“一带一路”倡议推行以来，中国出口格局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拉美、非洲、东南亚等地区的市场逐步扩大。此外，国家近两年也一直致力于稳外贸、稳投资、保供应链，内外形成合力，会打牢内需基本盘。

4、侠客岛：中央提到要“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虽然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数量一直在扩大，但很多人有现实顾虑，比如在住房、子女教育、医疗上的负担仍比较重，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口收入不高，疫情也导致失业率提升、中小企业面临巨大冲击。这种情况下，消费能有效提振吗？具体有什么办法？

彭文生：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关键在于提高收入水平，增加工资在分配环节的占比。以往的增长模式，不同程度上抑制了百姓的消费潜能，出口拉动的驱动方式，往往需要压低工人工资，以提高产品竞争力；基建推动型的财政扩张，必然强化了政府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房地产为主的投资驱动也会挤占居民的其他消费。

拉动内需的措施，可以分为短期、中期、长期三种。短期措施可以降低私人部门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刺激当下的消费、投资。比如，采用临时性的超常规财政刺激措施，如临时性降低增值税（一年后恢复），以此提升消费者对商品价格将会上涨的预期，发放有时效性的非必需品消费券等，这些都能激发当下消费。中期措施主要着眼于财政、货币政策。两个维度上的导向值得关注：一是横向方面注重结构影响，精准滴灌，引导社会资源支持实体经济，关键是保民生、保就业；二是纵向方面强调跨周期设计和调节，避免短期需求刺激以加剧中长期失衡为代价。这两个维度都要求坚持“房住不

经济双循环要推动 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央多次提到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一些海外媒体把关注点更多放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上，认为“这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剧逼迫的被动应对”，担忧中国是否会关起门来封闭运行，甚至还有人认为“中国要停止开放”“中国发展将向内转”。这都是对“双循环”新格局尤其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误解。

谋求发展、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大战略

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在外部环境深刻复杂变化和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背景下的主动调整，是推动我国从原有的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相对分离，转

向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通过畅通国内循环推动更高水平参与国际循环，又通过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推动建设普惠包容、平衡共赢的开放型世界经济。

改革开放后，我国从设立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起步，逐步扩大对外开放，1988年中央提出“沿海发展战略”，利用我国充裕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与国际资本和技术嫁接，发展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和市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加快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在参与国际分工实现产业升级，逐步成长为“世界工厂”并在2011年跃居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与此同时，在全球范围总体上形成以美欧为消费市场和研发中心，东亚

炒”。扩大内需不能靠拉动房地产需求，因为房价和信用相互促进，短期看起来似乎扩大了内需，但高杠杆风险不可持续。

长期措施方面，结构性改革非常重要。尤其需要限制垄断、鼓励竞争，继续推进劳动友好型数字经济发展，进一步加大对中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特别是针对疫情冲击的救助，推动增值税改革，降低中低收入者的流转税税负。

5、侠客岛：大家都很关注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一个现实难题是，中国还在背负既往的发展包袱，同时，新兴产业面临技术压力，尚未形成规模优势。一些人认为，新兴产业尚不足以“挑大梁”，传统基建一段时间内恐怕还是经济发展引擎，房地产刺激经济的办法万不得已时还是得用。对此您怎么看？

刘元春：新的增长引擎系于创新驱动。中国的创新驱动战略在过去10年已经打下了良好基础，创新环境和创新主体都得到了提升和增强。中国的世界500强企业 and 独角兽企业不断增多，全球专利研发数目也稳步抬升。只要进一步落实创新发展战略，破除制度瓶颈，比如打通妨碍市场配置资源机制体制上的问题，新一轮改革红

利就能显现出来。

但创新驱动必须解决核心技术问题。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一定要靠自己在体制机制上进行全面创新、全面改革，将资源真正集聚在基础性研究领域，同时打破核心技术卡脖子的现状。中国已经有以国家主导的大规模研发投入，这是很好的产业基础。

此外，我们有超大市场，且有足够韧性，能够培养优质的内生创新路径。虽然这两年我们会经历艰难过程，但这正是摆脱一些西方国家技术封锁的必要关口。在这方面，我们不必妄自菲薄，要有战略定力，把产业发展规划一步步落实到位。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新兴大国，必须突破技术崛起的瓶颈，自我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是大国崛起的关键；大国经济必然以内需为主体，这是大国发展的一个规律；贸易战、技术战，也是大国博弈的必经之路。

因此，不用对小的时点和波折进行过度解读。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中华民族复兴势必要冲破西方一些国家的封锁打击。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我们的新发展格局真正开创出来。

（2020-8-17 海外网）

特别是中国为生产基地和制造中心，中东拉美为能源资源输出地的“大三角国际循环”模式。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参与的“国际经济大循环”模式面临挑战，对投资和出口以及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造成内需与外需不平衡，投资与消费不协调，工业比重过高且附加值低，服务业发展滞后，全要素生产率贡献趋于下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强化等问题。在此背景下，我国提出要把扩大内需作为长期战略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

从国际上看，“大三角国际循环”模式也暴露出问题。美西方出现过度消费、过度负债，制造业空心化、中等收入群体萎缩，民粹主义滋生等问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推动全球化发生重大转折，经济全球化从高潮转向低潮，国际贸易和跨境投资增速放缓，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收缩，逆全球化思潮抬头。新冠肺炎疫情加剧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大三角国际循环”模式大有走向终结的势头。可以说，“双循环”是我国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发展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大战略。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要求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但如果像有人认为是的那样，我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已经形成内需主导的经济体系，在中美摩擦加剧、全球化进入低潮期和一些国家试图推动“去中国化”的背景下，我国就是放弃参与国际经济循环，也能够完全依靠国内经济大循环实现经济发展，这种想法也是幼稚的。

事实上，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活动都不可能

完全封闭起来运行。我国早已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体系，即便是扩大内需，也离不开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协同配合，产业技术进步也离不开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封闭起来脱离世界主流，只会拉大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我国参与国际循环遇到一些阻力和挑战，并不意味着国际循环重要性的下降。那种认为国内大循环可以封闭运行的观点，事实上会自觉不自觉地起到助推经济“脱钩”作用，从根本上讲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

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打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和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从根本上说是一体的。高水平开放，就要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打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就要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公平竞争制度，更加积极主动推进深化改革，促进国内规则规制更好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更好联通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

应该看到，我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的开放程度仍然是偏低的，距离经合组织国家平均开放水平仍有差距。打通国内经济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有助于提高我们整体的开放水平。一方面，打通国内经济大循环，有利于我国企业提高在国内市场竞争力，更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另一方面，有助于更好发挥外商投资企业“外引内联”的独特优势，通过实施好《外商投资法》及配套法规，放宽市场准入，进一步营造保障外资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更最大限度地挖掘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的潜力，维护我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

（2020-8-11 新华网思客热点）

（上接第17页）

第五，加强自组织建设，打造学习型社会和智慧社区。大数据技术的确可以充分整合政府部门和基层社会数据，排除社会安全隐患、管理好人口流动，解决社会矛盾问题，提升社会管理质量。但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不是在被动地接受管理，社会系统运行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社会治理体系无论多么完善，都不能削弱社会的自组织能力，相反它应该内嵌于社会自组织中才能发挥长效作用。因此，谈及社会治理体系智能化，千万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全场景智能化监控”。在系统科学的意义上，自组织主要是社会有机体自我演化出的一种秩序

结构，它主要受规则支配，而且这种规则能够随环境变迁不断变化。建设学习型社会，其内涵不止于知识的传播，更为重要的是群体交流和群体智慧的形成，这是社会自组织的基础。在5G增强网络的矩阵中，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的结合将更加紧密，社会群体之间深入互联互通，形成广泛的交融和理解。基层群众通过各类移动平台（App）使利益诉求和公共意见产生碰撞，大家在交流中生成社区智慧，以共识为基础的“想法流”把各方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从而增强社会网络韧性、促进社会和谐。

（2020-8-26 爱思想）

中美新冷战虚实几何

特朗普对 TikTok（抖音海外版）下手了，蓬佩奥暗示微信将是下一个目标。据美国媒体报道，进入特朗普政府视野的中国科技企业名单，远不止这两家。在中美双边关系中，目前的美国几乎是以恶化关系的单行为来凸显存在感。如果考虑到中美相互关闭领事馆，以及近期包括蓬佩奥在内的美方官员，就对华外交发表的一系列冷战式讲话，很难不感觉到中美关系在螺旋式下滑。唯一的疑惑是，这种下滑是否会直接滑向新冷战。



新冷战山脚下

“我们已经站在一场冷战的脚下”，这是基辛格去年 11 月对中美关系所作的判断。那时，中美矛盾的主要焦点还是经贸问题，以及中美经济、科技脱钩的可能性。但从当时特朗普政府对外交操作手法来看，已经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想打新冷战的苗头。新冠危机是国际政治变化的加速器，这一点在中美关系中体现得最为明显。美国疫情恶化之后，特朗普政府对华态度急转直下，新冷战的“图像”变得更为清晰。

中美关系目前的现状，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分析。第一，这里面有人为的因素，即特朗普政府故意恶化双边关系。第二，中美关系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即日益凸显的战略竞争特性。没有特朗普政府的“人为操作”，中美战略竞争不会演变成像是在打新冷战；而没有战略竞争的政治土壤，“人为操作”的效果不可能立竿见影。如果说基辛格当时的判断是“站在冷战的脚下”，那么如今的状态可以说是，特朗普正带着美国往冷战的山顶爬。

“人为因素”最直接的证据，是特朗普政府出于选举需要“打中国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7 月 23 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随着美国新冠疫情的恶化，包括特朗普的女婿兼顾问库什纳在内的白宫高官认为，能凝聚特朗普政治基本盘的唯一方式就是攻击中国。美国前海军上将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 8 月 1 日在彭博社撰文称，特朗普政府已经明确认定，从现在起到 11 月的大选，中国将是一个能带来好运的百宝箱。

是不是百宝箱不好说，但特朗普此番操作的逻辑，是清晰可见的。这个逻辑背后的驱动因素，是中美战略竞争的态势。这种态势的形成，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实力的快速崛起，以及美国对中国认知的变化。奥巴马政府后期，美国已经开启了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但那时的竞争，美国还保持着“体面”，没有无下限地恶化中美关系。如今特朗普政府能营造出新冷战氛围，包括但不限于白宫的美方对华认知的变化，起到了更为关键的作用。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今年 4 月的民调数据，2017 年特朗普初入白宫时，美国人对中国持正面与负面看法的比例基本相当，分别是 44% 和 47%。而在 2020 年，持负面看法的比例增加到 66%，持正面看法的降为 26%。两个比例都创下了 2005 年以来的历史纪录。如果以党派倾向为界，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共和党占比 72%，但民主党的比例也有 62%。根据这项调查，美国人把中国的实力与影响力视为最大威胁的比例竟然高达 62%。

美国民意对华态度的变化，与特朗普政府的刻意操弄直接相关。但同时也应注意到，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以及美国战略界，对华认知也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7 月中旬，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发布了一份长达 80 页的“政党纲领”（Party Platform）。这份文件意在为今年 8 月民主党全国大会上，拜登在内政外交上的竞选纲领定调。读了文件中关于对华政策的部分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即民主党对华认知在“特朗普化”。比如，不仅在政策上强调要对华强硬，而且在叙述上把“中国”与“中共”区分开。

美国前海军上将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 8 月 1 日在彭博社撰文称，特朗普政府已经明确认定，从现在起到 11 月的大选，中国将是一个能带来好运的百宝箱。

美国战略界对华外交的反思始于奥巴马政府时期。虽然当时较为主流的观点，是主张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但认为应该通过打新冷战的方式来竞争，还是非常边缘的声音。而特朗普入主白宫以后一系列冷战式操作，就像是大 V 直播带货，提升了中美战略竞争中新冷战的“品牌”。曾经创造了“中美国”（Chinamerica）这个词汇的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尼尔·弗格森，在最近的文章也改口了，开始担忧中美正在滑向新冷战。

选择而非事实

但是，新冷战的论述在目前的美国“畅销”，与中美新冷战是否已成事实，不能完全划等号。如前文所述，目前的情况确切地说，是特朗普政府在带领美国向冷战的山顶爬，但中国并没有想着要与美国来一场“决战紫禁之巅”。毫无疑问，中美战略竞争正在，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都将变得越来越激烈，但两国关系是否注定滑向新冷战，并不取决于特朗普政府单方面的意愿。中国如何回应，以及世界其他主要大国的态度，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无论你们是否喜欢，历史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终将埋葬你们！”这是 1956 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对西方国家驻莫斯科的大使们说的话。这话可以说是当年美苏冷战的经典解释：第一，在态度上针尖对麦芒，既有挑战方也有应战方；第二，意识形态上“你死我活”，双方没有调和的余地，一方的存在即意味着另一方面的消失。而这两点，在目前的中美关系中都不存在，只是特朗普政府单方面地希望朝那个方向引。

对于美方高官高调的冷战式话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曾回应说，美方一些人出于意识形态偏见，不遗余力把中国渲染成对手甚至敌人。“中国无意挑战或取代美国，无意与美全面对抗。我们关心的是提高本国人民的福祉，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对美政策没有变化，愿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精神发展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事实上，截至目前中国官方的表态，没有任何“配合”新冷战的意思。

西班牙政治家、北约前秘书长哈维尔·索拉纳今年 6 月撰文称，刻意制造的冷战警钟，是在用绝对主义掩盖现实主义，把选择当作了事实。“美中两国会是竞争性超级大国，但它们不一定重演美苏当年的冷战。”他认为，像其他任何大国一样，中国会寻求塑造符合自身利益的全球环境，也会寻求边界之外的某些群体的支持，

但中国没有试图以自己的模板来塑造其他国家，而那些都是当年美苏常干的事。

蓬佩奥在 7 月 23 日的对华政策演讲中说，“如果自由世界不改变共产中国，那么共产中国将改变我们。”在美国学者瑞安·哈斯和米拉·拉普-胡珀看来，美中竞争中的确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但如何认定意识形态在双边关系或未来战略中的角色却是模糊不清的。这两位学者认为，目前有些学者只是为了战略竞争而聚焦两国意识形态与政权体制上的差异。“从广义层面看，北京寻求的是国际社会对其政经模式的认可或者无敌意。”

7 月 28 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与法国外长勒德里昂通话时说，值得警惕的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此前发表演讲，试图重新挑动意识形态对立，把世界引向一场新的冷战。“世人仿佛看到已经扫入历史垃圾堆的麦卡锡主义企图卷土重来，如果任由这种阴谋论得逞，不仅中美关系将陷入对抗的深渊，世界将陷入分裂的危机，人类的前途命运也将陷入危险的境地。”那么，国际社会将倾听“反冷战”的声音，还是相应美国的冷战号角？

索拉纳上述文章中写道，如果把如今的国际秩序看作冷战式两极，那么就忽略的本身就是一极的欧盟角色。“欧盟不会把自己绑在美中拔河赛的绳索上，而是会着眼于探讨如何与美中两国的共生。”他认为，冷战心态不适合解决目前国际社会面临的新冠疫情、经济复苏、气候变化等重大挑战。“大国关系的演变没有注定的模式，虽然目前美中展开了竞争，但不能阻碍对合作领域的探讨。”

如果说当年的美苏冷战是趋势使然，那么目前的新冷战氛围更大程度上是“人造”的。正如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近日的文章所说，相比于冷战时期，目前的国际安全环境要平静得多。该文以东南亚为例，“即便最弱小的东南亚国家，也有能力在大国竞争中开展对冲外交”。而这一点与冷战时期不得不选边完全不一样。新加坡前外交官拉哈里·考斯甘认为，鉴于世界经济复杂的相互依赖，以及对中美两国的疑虑，没有哪个严肃的国家，无论大国还是小国，会在界定自身利益时，会简单地选择与美国或中国建立排他性联盟。

冷战心态不适合解决目前国际社会面临的新冠疫情、经济复苏、气候变化等重大挑战。“大国关系的演变没有注定的模式，虽然目前美中展开了竞争，但不能阻碍对合作领域的探讨。”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今年 11 月大选前，特朗普政府还会摆出一副与中国打新冷战的架势。但无论从中国的应对还是其他国家的态度来看，中美两国不太可能形

提高大数据时代 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治理”这一概念内含了协调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多种方法，大数据时代的社会治理智能化更加突显了治理方法的科技引领性。随着 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全面铺开，围绕数据采集和信息整理的相关服务，诸如大数据中心、云计算中心等将随之蓬勃发展。大数据技术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中的广泛应用，将深化我们对智能社会运行规律及其治理规律的认识。在这样的背景下，积极推进社会治理体系智能化，运用先进的理念、科学的态度、专业的方法、精细的标准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有助于增强社会治理预见性、精准性、高效性。

当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要求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体系”即复杂巨系统，在系统工程的意义上，大数据技术是社会治理体系获得科技支撑的物质基础，能够为社会治理体系的演化持续赋能。进入大数据时代，我们建构智能化社会治理体系具有两大方法论优势：一是系统集成。大数据技术能帮助我们总体上认识和把握社会矛盾和社会发展，在更加多元的维度上实现“1+1>2”的治理效能。二是深度学习。以数据密集型的大脑式计算方法打造智能化核心驱动力，实现社会治理科学化、精细化。在社会化大生产快速发展的今天，地理上的以及行业的边界日益被人口、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流动所打破，社会网络空间的非线性

成美苏冷战对垒。而且，如果特朗普败选，新冷战的论述还有可能退潮。前文提到的民主党“党纲”，虽然在对华论述上“特朗普化”，但也明确提到“不打新冷战”：民主党的战略不会追求适得其反的单边贸易战或者与中国陷入新冷战的陷阱。

应对外部环境变化

尽管中美新冷战的前景并非注定，但两国战略竞争加剧却是可以肯定的。瑞安·哈斯和米拉·拉普-胡珀的上述文章就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了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战略目标，中国总体上采取的是避险策略。“虽然中国寻求避免大国对抗，但随着中国更加接近国家目标，中美两国的利益将变得越来越难以调和。”目前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企业的打压，带有强烈的特朗普式霸凌色彩，但很多做法会在 2021 年后得到延续，无论他是否成功连任。

如果结合特朗普执政三年多以来的外交与目前他的对华政策，可以感知到这样一个“不祥”的征兆：特朗普正在把他的对华强硬甚至恶化中美关系，作为其主要的政治遗产。对比特朗普政府对欧洲、中东以及俄罗斯

等外交作为，他对中美关系的“改变”是最为突出的。更为关键的是，这种改变在朝着这样的论述发展，即与中国脱钩，美国会变得更好。换句话说，把美国的问题归咎于中国，正在被嵌入美国的政治中，其影响势必延续到今年大选之后。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当年美苏冷战是“对撞”，即比拼实力和优势，目前的新冷战思维是“脱钩”，即以与中国切割的方式迟滞中国的崛起。这种操作手法的影响，绝不会只限于中美双边关系。特朗普政府最近对 TikTok 的打压，最终能否如其所愿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客观上将推高中国企业布局海外的成本。最近中国提出“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模式，足见外部环境变化之大。

现阶段中美关系急转直下，有美国选举政治的因素，也与两国战略竞争有关。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目前的美国对中国都存在误解。但是，中国在战略上不能误判。一方面，不能陷入新冷战的陷阱；另一方面，在正视美国实力的基础上，以更加长远的眼光布局战略竞争。

（2020 年 17 期 南风窗）

动力学特征越来越鲜明。但是，面对全球化背景下社会总体图景的变迁，社会治理体系的系统效应尚未充分发挥出来，社会治理体系碎片化和力量分散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智能科技介入将极大地提升社会治理体系的整体性和协同性，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的能力，进而实现标本兼治和持续有效的长程管理。

第一，以新基建为契机，锻造强大的信息能力。大数据技术不是对客观世界的随机采样，而是能反映总体情况。正如美国数据科学家迈尔·舍恩伯格所言，“大数据发展的核心动力来源于人类测量、记录和分析世界的渴望”。大数据技术的进步能让我们更加完整和精准地认识世界，一个大规模应用数据、组织生产和共享经济的时代正在开启。近来新基建被广泛重视，它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可以说，新基建将极大地带动社会治理体系的数字化升级。受益于当下的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社会治理体系具备了大数据采集与计算的物质条件。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将驱动社会进入万物互联时代，5G与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深度融合，推动形成了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核心能力。尤其是5G网络，与4G相比具有高传输、低延迟、泛连接的特点，应用场景涉及增强型互联网、3D视频、云办公、增强现实以及自动驾驶、智慧城市、智慧家居等。以5G网络为主体架构的新一代“信息高速公路”将为海量的数据和信息传递提供一条宽阔的高速传输信道，这是社会治理体系形成强大信息能力的保障。

第二，建设城市大脑，提升协同治理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强调整体性和协同性，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结构的层次呈现多元化和弥散化，给协同治理带来了挑战。社会治理体系智能化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支撑。人工智能如同云端大脑，依靠“信息高速公路”传来的数据进行深度学习和系统演化，完成机器智能化进程。目前方兴未艾的城市大脑建设正是这一进程的典型代表。就当前的实践看，城市大脑主要是为公共生活打造的数字化界面，包括交通出行、数字旅游、卫生健康、应急防汛等若干系统的应用场景，每天生成的协同数据多达上亿条。来自四面八方的在线数据不是“静态的”、而是“运动的”，城市大脑汇集的主题场景皆为现在进行时。随着数据采集的颗粒度越来越细，城市大脑能够高效便捷地掌握社会治理场景的确切信息和事件资料。此外，在城市大脑建设中，多种网络实现有效连通，信息访问、接入设备的协同运作打破了过去

部门、企业、团体之间的数据孤岛，从而推动形成了立体化、网络化的社会治理体系。城市大脑主要通过模型、算力和算法对大数据进行分析，并根据治理目标剔除干扰，提取信息，进行研判和预测，从而获得智能化解决方案，从技术上保障了社会治理效能最大化。

第三，立足民生改善，做好智能公共服务。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国家建设得好不好，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看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怎么样。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新一轮大数据智能化的浪潮将会对包括智能制造、数字媒介、科技创新、医疗、教育、交通等多个领域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提升智能化公共服务水平，就是要围绕民生改善，充分利用好泛在于社会各领域的的数据资源，加快释放“数字红利”，有效调配公共资源，协调多方利益。比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建立覆盖城乡的无线政务应用服务平台，开发并完善一体化移动办公系统，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重要民生问题上解难题、办实事。再如教育领域，身临其境的学习体验将普遍化。在传统教育模式下，边远地区的学生较少接触高质量的教育资源，随着5G、VR/AR、AI等技术引入教学场景，就会给他们带来与大城市的学生一样的学习体验。当社会因教育资源均等化而实现整体素质的跃迁，社会生产力和文明程度的提高也会相应地优化社会治理体系，促进社会和谐与安定团结。

第四，着眼风险防控，开发适用于社会治理体系的CPS。社会治理涉及面广、问题复杂，不仅需要定性判断，还需要作科学的定量分析。社会治理体系可利用5G网络超大连接的优势，收集社会治理策略执行后的各项微观数据，并且进行实时监测、量化分析、动态预测、评估效果，客观评估社会安全总体形势。然后，根据监测到的大数据科学研判发展趋势，依据相关信息反馈，调整社会治理方略和社会政策。CPS即“信息物理融合系统”，是一个综合计算网络和物理环境的多维复杂系统，能够实现大型工程系统的实时感知、动态控制和信息服务。过去它被广泛应用于企业生产中，如今也可用来提升社会治理的运行效率。把CPS引入社会治理体系，对特定场景进行数学建模，并将模型映射到虚拟空间，实现决策过程的“人机结合”，有助于决策者对政策效果实施多方位和可能性推演，从而在社会治理中做到态势感知、风险预判、及时响应、预备处置。5G网络结合AI场景应用，为基于CPS的智能化社会治理体系提供了多主体协同行动能力，让防范重大风险社会问题真正成为可能。

(下接第13页)

小小餐桌，何以牵动中国？

“餐饮浪费现象，触目惊心、令人痛心！”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党的十八大以来，公务浪费行为得到有效遏制，但从家庭餐桌到酒馆饭店，食客已散、佳肴未动的餐饮浪费现象仍不少见。

眼下，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为各国敲响警钟，有人说，尽管中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粮食安全问题依然不容小觑；也有人说，考虑到今年干旱、洪水、疫情等因素叠加下可能导致的粮食减产，狠刹浪费之风，比任何时候都更紧要。小小餐桌，何以牵动中国？

巨量

其实，食物浪费并非“新鲜”现象。仅从一组数据，就能看出这种浪费规模之巨：6年前，联合国粮农组织、国家粮食局数据显示，中国每年生产的粮食中，有35%会在生产、流通、加工、消费环节被浪费。

据世界自然基金会与中科院联合发布的《2018中国城市餐饮食物浪费报告》，2013年至2015年，中国城市餐饮每年食物浪费总量约为1700万-1800万吨——注意，仅仅是“城市餐饮”这一环。在这一环上浪费的1700万-1800万吨粮食，够3000万-5000万人吃一年，相当于2015年全国粮食总产量的3%。同年，中国粮食进口量超过1亿吨，其中水稻、小麦、玉米进口量逾1100万吨；也就是说，光是城市餐饮业一年浪费掉的食物数量，就超过了中国该年主粮进口数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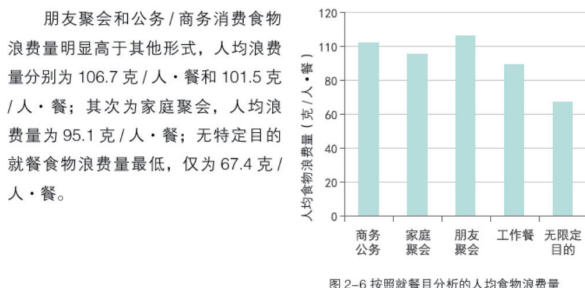


图 2-6 按照就餐目分析的人均食物浪费量

图源：《2018中国城市餐饮食物浪费报告》

环节

巨量食物浪费，究竟是怎么产生的？食物的损失和浪费，通常发生在食品供应链前端和末端。前者指食物在生产、存储、分配、零售环节的损耗，后者指食物在消费端被人为丢弃、浪费。

近年来学者研究表明，消费端食物浪费在中国整个食品供应链中占比最高：一是餐饮业的食物浪费。2018年，中科院等机构对北京、上海、成都、拉萨4座城市366家餐馆进行的实地调研发现，中国城市餐饮业人均食物浪费量约为每人每餐93克，浪费率为11.7%；二是家庭餐桌的食物浪费。2016年，中国人均家庭食物浪费量为每人每年7.6-10.9千克，全年家庭食物浪费总量为1055.6万-1501.6万吨；三是中小学校的食物浪费。2018年，城市中小學生每人每餐要浪费130克食物，浪费率为22%。在物质条件日渐富裕的当下，“舌尖上的浪费”确实触目惊心。

形势

有人问，“煮多了”或者“点多了”都是自己的事，难道还能造成天大的影响？都是花自己的钱，凭什么要全社会来约束？

不妨算笔账：按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干事戴维·比斯利提供的数据，全球每天有8.21亿人挨饿，另有1.35亿人正走向饥饿的边缘。联合国在2015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中专门制定了一项具体目标：只有在零售和消费端将人均全球食物浪费减半，地球才可真正进入“可持续时代”。

一些消费者认为吃饭讲排场、比阔气、爱面子、吃不完是自己的事，但实际上，全球每年生产粮食总量的三分之一被白白浪费，最多可致“每天30万人饿死”。

在“资源账”上，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刘晓洁认为，食物浪费意味着大量水、土地、能源以及各类生产资料的无效消耗，同时增加了水体污染、土壤污染、温室气体排放等环境负荷。

《2018中国城市餐饮食物浪费报告》显示，北京每

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需建立长效机制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加强立法，强化监管，采取有效措施，建立长效机制，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切实培养节约习惯，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表明了党中央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和节约粮食资源、反对铺张浪费

的坚强决心。为更好地杜绝“舌尖上的浪费”，必须建立长效机制，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推进文明用餐，践行绿色文明新生活方式。

建立长效机制，必须以树立粮食安全观为统领，关注粮食安全，把节约粮食资源摆上国家安全的重要位置，对粮食安全始终要有危机意识。以制度建设、顶层设计

年餐饮食物浪费的生态足迹为 30 万公顷，约为全市耕地面积的 1.3 倍；按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徐捷的说法，全球每年约有 13 亿吨粮食被浪费，“相当于每年投入农业生产的 14 亿公顷土地和 2500 亿立方米地表水、地下水被白白浪费”。

对中国而言，反对铺张浪费更是一笔“精神账”：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坚决清理整顿“舌尖上的浪费”、“餐桌上的应酬”，到制定《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从启动节俭养德全民节约行动，到发起吃尽盘中餐的“光盘行动”，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传统不能丢。

安全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后，俄罗斯、越南、泰国、哈萨克斯坦等 10 多个国家宣布限制或部分限制粮食出口。那么，中国的粮仓储备足不足、数量够不够？“厉行节约”是否意味着“粮库告急”？

国务院新闻办 2019 年发布的《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明确指出，中国粮食总产量连续 4 年稳定在 6.5 亿吨以上，人均粮食占有量为 470 公斤左右，粮食安全保障水平远高于 17%-18% 的国际警戒线；中国谷物自给率超过 95%，稻谷和小麦完全自给，进出口主要是品种调剂。

一句话，中国已经实现“口粮绝对安全”、“谷物基本自给”。但白皮书也指出，从中长期看，中国的粮食产需仍将维持“紧平衡”态势，现在绝非松气懈怠的

时候：

中国人均口粮消费虽然稳中略降，但饲料和工业转化用粮消费持续增加，粮食消费总量刚性增长；粮食生产不断向核心产区集中，粮食市场大幅波动风险始终存在；当前农业生产成本攀升，在确保绿色发展和资源永续利用的同时，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压力较大。

此外，截至今年 8 月 5 日，中国主产区夏粮小麦累计收购量同比减少 938 万吨；有专业人士计算，若让中国粮食“全口径”实现自给，还需增加约 3 亿亩耕地来种植大豆等作物；更要看到今年全球旱灾、水灾、蝗灾的冲击，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带来的外部风险和压力。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表示：“粮食产业稍有‘风吹草动’，便会影响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只有开源节流，才能让大国粮仓的根基更加牢固。”

“一粒粮食能救一个国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漫长的中国历史，饥荒曾是挥之不去的梦魇，王朝兴亡更迭往往都与之密切相关；让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完全吃饱，实际上就是过去几十年才实现的成就，这得益于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农民辛劳以及国际物流发达等因素。

丰年不忘谨时，道理并不难懂。对于一个拥有 14 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坚持一手紧抓粮食生产，一手狠抓厉行节约，才能真正有底气将自己的饭碗端牢。

(2020-08-14 侠客岛公众号)

为突破口，制定厉行节约、制止浪费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实施管理办法等，发挥制度的权威性与严肃性，对浪费行为予以严惩。以构建政府、社会与公众三位一体新格局为目标，在充分发挥政府引领作用基础上，发动公众积极参与，在全社会营造爱惜粮食，节约粮食资源的良好社会氛围。以践行绿色文明新生活方式为目标，通过在全社会倡导节约粮食资源，推进绿色文明新生活方式在全社会普及。



一是出台节约粮食、严惩浪费的法律法规。节约粮食资源不能单靠引导，必须加强立法，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从法律法规层面对浪费粮食资源的行为进行规范与约束。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厉行节约反对食品浪费的意见》以及近年来社会上持续推进的“光盘行动”，对制止食品浪费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进一步杜绝“舌尖上的浪费”，可以借鉴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对粮食、食品等立法的先进经验，推进反食品浪费工作法制化进程，积极推动节约粮食、反对食品浪费法规建设，推进粮食立法进程，建立有利于促进粮食节约的法律机制，制定食物、食品削减推进计划或实施方案，坚决抵制食品浪费行为，使节约粮食成为每个人生活的常态。

二是把杜绝“舌尖上的浪费”作为文明城市创建、提升公众文化素质的重要内容。创建文明城市，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文明用餐也要上升到新的高度，并作为重要内容纳入文明城市创建考核体系，使之成为文明城市创建必须完成、达到的约束性指标，通过小小一粒米，倒逼用餐文明，助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不断跃上新台阶。城市公众文化素质，不仅仅体现在科学知识

普及、学历教育、职业培训等方面，还体现在节约食品资源上。良好的资源节约意识和行动是观察公众文化素质的重要窗口，背后折射出城市的文明程度和高度，必须予以重视。把杜绝“舌尖上的浪费”作为形成绿色文明新生活方式的突破口，积极倡导厉行节约食品资源，反对铺张浪费的绿色文明新生活方式。

三是持续不断地加强宣传。杜绝“舌尖上的浪费”，要持续不断地通过广播电视、微信、微博等方式和渠道开展各种宣传，进一步加大反食品浪费的宣传力度，弘扬先进典型，曝光浪费现象，特别要做好“节约一粒米”的公益宣传，宣传国家、广东省粮食生产和供应情况，大力破除讲排场、比阔气的不良风气，促进反粮食浪费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为。特别要注重宣传实际效果，避免搞不切实际的形式主义。积极培育节约粮食为荣，浪费粮食为耻的社会风气，努力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不搞“一阵风”式的宣传，要以“钉钉子”精神，切实把宣传做实做细。

四是对餐饮企业加强规范指导。餐饮企业要通过多种方式引导顾客理性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在明显位置张贴宣传标语或宣传画，摆放指示牌，提醒适量取餐。餐饮企业的服务人员，要在顾客订餐、点餐等环节实施有效的消费指导与引导，对超量点餐要进行温馨提示，顾客如有剩余食物，提醒顾客打包，餐饮企业不得设置最低消费。为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结合分餐制经营方式的推广，开发适合不同消费规模和需求的产品配套组合，保证产品质量。对于自助点餐实行计量收费，多供应小份食品，方便用餐人员适量选取。机关、企事业单位饭堂要按照健康、从简原则提供饮食，合理搭配菜品，注重膳食平衡，做到既满足消费需求，又避免餐饮浪费。

五是多部门齐抓共管，共同推行科学文明用餐。商务部门要制定餐饮业服务规范，加快建立健全餐饮业标准体系；卫生健康部门要指导餐饮企业提供符合膳食平衡要求的食品；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结合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量化分级管理工作，推动餐饮企业加大反食品浪费工作力度；文化旅游部门要强化旅游饭店质量等级评定标准中反对食品浪费的要求，加强对标准实施的监督检查。在社会招募一批义务监督员，明察与暗访相结合，对餐饮企业进行监督检查，发现浪费行为予以批评或上报有关部门，发动社会力量推进餐桌上的文明，着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引领文明用餐消费新时尚。

(2020-08-24 南方日报)